

# 天安门升国旗仪式的变迁

自2018年1月1日起,天安门广场升国旗仪式,由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和军乐团接替武警天安门国旗护卫队执行。武警部队从1982年12月28日正式担负天安门广场升降国旗和国旗哨位守卫任务,这段长达35年的光荣与辉煌,已经变成历史。

1949年开国大典上,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亲自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1950年的10月1日,国庆升旗的按钮由北京供电局的电工师傅程红年按动。1951年10月1日起,年仅22岁的北京供电局青年电工胡其俊担任了天安门广场升国旗的任务,此后一直到1976年。

1976年11月26日,北京卫戍

区部队担负起升旗任务。从此国旗每天升旗,不再是节假日才有的特例,但升旗时间依然只凭战士肉眼观察天色,也没有隆重的仪式,只是由两名战士扛着国旗并肩而行,通过长安街时,还需要给自行车让道。等太阳快落山的时候,再把国旗降下,扛回来后放在驻地房檐下。

1982年12月28日,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成立,天安门守护国旗任务由北京卫戍区移交武警部队。武警部队很快就组建了国旗班,开始使用规范庄严的升旗仪式:三名身穿礼服的战士,由中间一名扛旗,两名战士护旗,一同前进。为了表现祖国与日月同辉的意思,每天让国旗

与太阳同时升起和降落。根据多方提供的资料测算,太阳从跃出地平线到完全升起的时间为2分零7秒。所以,国旗从地面升至旗杆顶端用这一时间长度。经多次调试后的升旗机关,恰好使两个时间吻合。

这样的升旗仪式一直采用了近8年时间。

1990年10月1日,《国旗法》颁布,要求升国旗时必须奏国歌,让升旗仪式更加庄严隆重。原来的国旗杆周围都是封闭的,升降国旗时,战士需要跳进跳出,既不方便又不雅观。经有关部门批准,国旗基座于1991年2月23日开始改建。改建后,国旗杆升高至30米,国旗也改为长5米、宽3.3米的

特号旗,是全国升降的国旗中最大的。

1991年4月,国旗班扩编为国旗护卫队,5月1日正式开始启用新的升旗仪式。升旗方队由36名武警官兵组成,其中擎旗手一名,左右是怀抱冲锋枪的两名护旗兵,后面是一名佩戴指挥刀的带队警官,其后是由32名肩扛56半自动步枪的护旗队员。每月的1号,有60名军乐队队员在升旗现场演奏国歌,平时播放国歌录音。

新的升旗仪式亮相后,每天到广场观看升旗仪式的群众都有几万人,重大节日甚至达到一二十万人,升旗仪式很快成为首都北京最亮丽的一道风景线。

综合《党史文苑》《晚晴》

## 胡适帮助梅兰芳赴美国唱戏



梅兰芳1930年美国行

1930年1月,梅兰芳的美国之行,称得上是履行了文化使者的使命,极大地提高了中国戏剧在国际上的地位和梅兰芳本人的声誉;同时,由于胡适的襄助,也加深了二人之间的友谊。

1930年1月,已大红大紫的京剧大师梅兰芳,应“华美协进社”(系由胡适、张伯苓、梅贻琦、杜威等中美知名学者组成的民间组织)邀请赴美演出,由此开中国戏剧出演于西洋之先河。

1930年1月18日,梅兰芳一行21人离沪乘船经日本赴美,送行者可谓冠盖云集,众多重量级的头面人物到场,胡适也在此送行的行列之中。途经日本时,梅还专门致信胡适,对胡在上海所给予的帮助和亲自送行,表示感谢。

为梅兰芳赴美演出,胡适以英文写了一篇《梅兰芳和中国戏剧》,刊登在旧金山编印的《梅兰芳太平洋沿岸演出》英文专集中。文称梅“是一位受过中国旧剧最彻底训练的艺术大师”,具有“非凡的艺术才能”,“是个勤奋好学的学生”……洋溢着赞美颂扬之词。此文系胡适出于友情的自发之作,事先梅兰芳恐未必知晓。

自1930年2月16日梅兰芳于纽约首演,至最后一站洛杉矶,长达五个月,共演出整整100场。梅兰芳此行还获得了波摩拿学院和南加州大学分别授予的荣誉文学博士学位,这也是前所未有的。

7月18日,梅氏一行载誉返国,仍于上海登岸,受到申城各界的热烈欢迎;次日上海各界又于大华饭店举行欢迎会,胡适均到场。7月25日,梅兰芳又专程赴胡适寓所登门拜谢。据《天津日报》

## 庭审张学良 主审官临时“加星”

1936年12月发生的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为力挽蒋介石的“面子”,陪送蒋飞回南京,此举铸成其终生大错。蒋到南京后即将张学良扣押软禁,并要提交军事法庭审判。可却遇到了麻烦:按军事法庭的庭审程序规定,对将级军官的审判,应由一名比被告者的军衔高一级的军官担任审判长,另加两名普通军官任审判员共同组成审判庭,方能开庭。由此难题就出来了——张学良的军衔为一级上将,据此推判他的审判长必须为特级上将,可国民党军队中的特级上将仅有蒋介石一人,空前绝后。

此案是断不能由蒋介石亲自出马审理的,拟定的审判长为德高望重的李烈钧,可李的军衔却为二级上将。让二级上将来审一级上将,既不合程序法又将成笑柄,这可如何是好?

无奈之时不能变法只能变通。蒋介石即通过国民政府为李烈钧临时造假加“星”,升至“特级上将”。开庭的那一天,由法庭的书记官率先向“罪犯”张学良宣读了国民政府对审判长李烈钧晋升“特级上将”的决定书,这等于由法官先向罪犯对自己“验明正身”,然后才进入正式的审判程序。

审判结束后,李烈钧立马就被“星”复原位,让人跌破眼镜。

据《文史博览》

## 方志敏被捕后曾谋划越狱

1935年1月底,方志敏不幸被俘,不久被国民党军警从上饶押往南昌。一个偶然的契机,让他产生了越狱抗敌的想法。

一天,一个看守在闲谈中告诉他:“处里呈了一封公文上去,说你们没有投降之意,拟定要枪毙;但上面批了下来,却是‘缓办’两字。看来,你们的案子,一时解决不了了。”这个消息立即引起了方志敏的注意,并立即产生了利用这一契机冲出牢笼的想法。

虽然方志敏知道越狱的希

望极其渺茫,但他仍然坚持发动在押的狱友们“要越狱一齐出去,生死存亡在一起”。为了更加了解敌人的情况,方志敏开始对“看守兵和卫兵们,则不放弃一点时机,向他们做宣传工作,极力去争取他们,去取得他们的同情和帮助”。

富于革命经验的方志敏深知成功越狱的关键在于外援,没有外援,越狱则毫无希望,因此,他千方百计地与地下党取得联系。1935年6月,方志敏终于托人

将《给党中央的信》交给了上海的地下党。在该信中,方志敏首先汇报了自己越狱的计划:“我们认为越狱是有极大可能,若得外援,可望成功。但四个月来,都找不到一人来,而中央也不能知道我们的情形,这是我们最感苦闷的事情。”

不幸的是,由于当时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正准备战略转移,无法为狱中的同志们提供援助,越狱最终没有成功。

据《人民政协报》

## 周恩来的骨灰到底撒在了何处

1月8日是周恩来逝世42周年纪念日。周恩来生前留下嘱咐:死后火化,不保留骨灰,把他的骨灰撒向祖国的山山水水。

### 第一把骨灰撒北京

1918年夏天,留学日本的周恩来回国过暑假,在北京与父亲一起生活。这是北京给他留下的最早印象。一年之后的五四运动,周恩来数度在京津之间往返,和同学一起在北京请愿。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20多年,与首都人民朝夕相处。把他的骨灰撒在北京,就是让他和首都人民永远在一起。

### 第二把骨灰撒密云

北京是个严重缺水的城

市。周恩来先后主持有关方面修建了官厅水库、十三陵水库、怀柔水库和密云水库。因为密云水库的规模比较大,周恩来曾花费的精力也更多。周恩来曾告诫工程指挥人员:“既要保证进度,更要保证质量,决不能把一个水利工程建成水害工程,或者是一个无利可取的工程。要把工程质量永远看作是对人民负责的头等大事。”

### 第三把骨灰撒在天津

1913年,因四伯父周贻赉从沈阳调天津任长芦盐运司推运科科长,周恩来也随之到天津,并于那年暑假考入私立的南开学校。周恩来在天津先后读书5年多,曾在天津组织领导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组织青年进步革命

团体“觉悟社”;他还曾在天津因投身“五四”爱国运动遭逮捕坐牢半年之久。

天津是他革命起步的地方,也是他多次涉险的地方,还是他与另一半邓颖超同志相识、相交、相知的地方。因此他对天津就多了一份热爱。

### 第四把骨灰撒滨州

周恩来期望死后将骨灰撒进“母亲河”,以报答生他、养他的母亲;同时,他回归了母亲河,也就回归了大地,回报了祖国。

此外,周恩来生前最后召见的罗青长说,骨灰撒到黄河入海口,还有一层含义:他是想通过海水把他的骨灰带到台湾,祈盼着祖国的早日统一。

据《红岩春秋》

## 钱学森回国收到神秘电报

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带着家人登上“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由美国旧金山启程前往香港,踏上归国之路。

回国的路上一共“漂”了21天,途经美国、日本、菲律宾,停了好几站。别的乘客都趁机下船走动走动,钱学森全家只在夏威夷下过船,其余时间都没离开船舱。因钱学森收到了一封父亲钱均夫发来的电报,内容很短,关照我们“沿岸切勿下船”。为了安全起见,钱学森夫妇照做了。有意思的是,等钱学森的夫人蒋英来到上海,向钱

均夫询问这封电报的时候,他却回答:我没发过。

这个秘密直到钱学森回国50年之后才有了答案。那时,钱学森图书馆还在筹建之中,正逢外交部解密了部分档案,在档案馆里找到了这封电报的底稿。电报上先是写了中文,下面是英文翻译,措辞跟钱学森在船上收到的一字不差。

原来,当时外交部惦念我父亲的安全,害怕他归国路上发生意外,特意以祖父之名叮嘱他留在船上,不要上岸。

据《老年生活报》

## 蒋介石借“实弹射击”清除异己

1928年7月25日,国民革命军以第九军第三、第十四、第五十四3个师以及第九军教导团缩编为第二师,师部于安徽蚌埠成立,辖三旅六团,师长由第九军军长顾祝同降任。第九军各师的团长多为黄埔一期生;副团长、营长、连排长多来自黄埔第一至五期。因此外人也把这支部队看成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一样的蒋介石嫡系部队。

第二师在蚌埠整训时,蒋介石发现黄国梁、涂思宗两个旅长不是黄埔学生,有意要把黄埔第一期学生提升起来当旅长,又碍

于黄国梁、涂思宗两人在这支部队里时间很长且作战有功,一直没想出把他们换下来的理由。

1929年1月,蒋介石命第二师在蚌埠附近举行一次战斗演习——“旅对抗”:第四旅由临淮关向蚌埠攻击,第五旅防御蚌埠,裁判官由蒋介石亲自担任。

演习于凌晨开始,当天大雾弥漫,两支部队快接触时双方忽然发生了实弹射击。蒋介石在蚌埠南边高地上观看,恰巧有实弹从他附近飞过,幸未伤人。他马上下令停止演习,集合连长以上军官训话,要查出

放实弹的官兵,否则先把两个旅长扣留查办。

大家看到这么严重,谁也不敢承认自己放了枪。结果,过了几天,黄、涂两个旅长同时免职,送去陆军大学受训;楼景越、黄杰同时升任了旅长。

涂思宗离开部队时对人说道:“这是总司令不要我同黄国梁干,演习出事故只是一个借口。不把我们撵走,楼景越、黄杰怎么能升旅长呢?师长(指顾祝同)是知道的,他只要能保持他的职位比我们多一个时期就很好了。” 据《人民政协报》